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0期（民國107年6月），85-1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居家必備：
《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學啟蒙（1915-1919）*

黃相輔**

摘　要

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對科學知識傳播的貢獻，然而過往研究著重新文化運動思潮下的啓蒙，鮮少討論五四前的情況。五四前的《婦女雜誌》其實含有豐富的通俗科學內容，涵蓋醫藥衛生、理化、生物、教育學等領域，以及各種與家政相關的實用常識。《婦女雜誌》對家庭範疇的偏重有其時代脈絡：一方面受日本傳入的賢妻良母論述影響，在男女分工的思維下強調家庭是婦女貢獻社會的重要活動場域；另一方面又基於科學改良家政的理念，期望藉由整頓家庭生活進而改革社會。兩位主編王蘊章、胡彬夏皆提倡普及女子教育，王蘊章尤其重視實用常識及娛樂教化，對雜誌在此時期的表現有深刻影響。《婦女雜誌》擘劃的改良家庭、日常生活與通俗教育等藍圖，反映了當代知識分子對現代化生活的想像，也不啻是有別於五四新文化模式的另一種啓蒙。

關鍵詞：《婦女雜誌》、王蘊章、胡彬夏、科學普及、改良家庭

---

* 本文於構思階段曾分別在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及北京商務印書館主辦之研討會上發表。作者特別感謝張哲嘉、葉韋君、侯嘉星、皮國立與王文基等教授對初稿的諸多寶貴建議，陳姃湲與連玲玲二位教授對賢妻良母主義流變的指正，以及施陸（Erik Schicketanz）對下田歌子與家政學研究資料的幫助。另外也要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使本文更加完善。
收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 年 7 月 23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引　言

1917 年 4 月，廣東潮州讀者丁小石去函《婦女雜誌》主編王蘊章（1884-1942），表示自從該雜誌發刊，三年以來「按期購讀，未嘗或輟」。他肯定閱讀《婦女雜誌》的好處，自認雖已成家、有妻有子，「居家所應備具之常識，從前本無所知，今乃稍得其梗概。」[1]這封通信並未透露太多丁小石本身的職業、教育程度等背景，只提及他童年曾略習英文，但很快輟讀，至今外文「隻字不識」，因此渴望以閱讀雜誌或函授學習的方式來增廣見聞。

無獨有偶，隔年赴湖南福湘女學任教的舒新城（1893-1960），也肯定《婦女雜誌》充當學生課外讀物補充常識的功用。福湘女學爲美國長老會辦的學校，除了提供一般教育的中學部外，兼有以培育小學師資爲主的師範部。然而舒新城不滿該校的教學方式不符合中國國情，批評學生缺乏常識、對時事不熟悉，甚至有即將畢業之師範生「對於中國教育制度、教育界情形，每每茫無所知」。舒新城改革教學的措施之一，就是指導學生養成讀報的習慣，「每日都爲之圈定若干段國內外的重大新聞，強其閱覽，……對於當時的《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新青年》、《新潮》、《星期評論》、《解放與改造》、《青年進步》、《婦女雜誌》等等亦復如是。」[2]他自認此辦法實施後，學生的常識進步不少。

在以上一串報刊名單中，《婦女雜誌》的角色是耐人尋味的，特別是它與《新青年》等標榜新文化的進步刊物並列。舒新城關注社會，自稱是很早覺醒

1　〈通信問答〉，《婦女雜誌》，卷 3 號 7（1917 年 7 月）。按：《婦女雜誌》早期的頁碼編排並不統一，往往各篇文章或欄目的頁碼未接續。爲免混淆，本文所徵引《婦女雜誌》文章皆不附頁碼。另外，本文徵引之各種報刊，主要來源爲中研院近史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2018 年 1 月 10 日檢索）與德國海德堡大學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oMag*): http://womag.uni-hd.de (accessed 10 January, 2018).

2　舒新城，《我和教育》（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上冊，頁 138、141。

接受新思潮的青年，[3]從他列的這份閱讀清單即可見一斑。然而後來被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羅家倫（1897-1969）點名批評為「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的《婦女雜誌》，[4]竟也能獲得銳意改革的舒新城推薦為必讀刊物，可見五四前的《婦女雜誌》並非如新文化知識分子批評的那般一無可取。從丁小石的通信，以及舒新城的改革措施，可以窺見當時無論是什麼性別或地域的讀者，皆可從閱讀《婦女雜誌》這份具有指標性的婦女期刊來增進知識。

《婦女雜誌》呈現給讀者什麼方面的知識？瀏覽各期目錄，不難發現其中有大量介紹科學新知或實用技藝的文章，題材涵蓋聲光化電，呼應其廣告所言「促女學之進行，謀教育之普及。文字淺顯，趣味濃深，科學、美術、世界要聞，無不應有盡有」的宗旨。[5]發行《婦女雜誌》的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是中國近代規模最龐大的商業出版機構，在教科書、辭典、期刊等各式書刊的編譯之外，甚至跨足博物教具與理化實驗藥品、儀器的經銷。商務多角經營的文化教育版圖，已有許多學者研究，甚至以「啓蒙事業」來形容之。[6]同時期商務發行的其他期刊，如《東方雜誌》、《學生雜誌》等，亦是以刊載介紹各類通俗科學知識的文章聞名。[7]清末民初之際，無論是啓蒙志士或底層百姓，普遍有開啓民智的呼聲與各種自發性開風氣、改造文化的實踐。[8]在那樣亟思教育普及的年代，以婦女為預設讀者分眾而成立的《婦女雜誌》，含有大

---

3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冊，頁 146。

4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 1 號 4（1919 年 4 月），頁 627。

5 〈商務印書館發行〉，《婦女雜誌》，卷 4 號 3（1918 年 3 月）。

6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7;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頁 19-35。關於商務印書館的研究歷來豐富，參見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7 尤其是《東方雜誌》與其主編杜亞泉的貢獻，近幾十年來經常是研究焦點，參見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陶海洋，《《東方雜誌》研究（1904-1948）》（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4），頁 43-68。

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 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第 2 版）；張仲民，〈清季啓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8（2010 年 6 月），頁 51-96。

量的科學教育內容，似乎便不足爲奇。然而《婦女雜誌》刊載的通俗科學文章，反映了什麼樣的知識範疇與內涵？讀者對於它們的反應又是如何？這些議題值得進一步商榷。

歷來對《婦女雜誌》的研究，雖然十分關注其啓迪婦女思想與知識的面向，但專門探討科技或醫學知識啓蒙的著作仍然是鳳毛麟角。張哲嘉對後期「醫事衛生顧問」專欄的分析，是較早系統地討論該刊傳播醫學衛生知識的研究。[9]陶賢都和章梅芳等人的論文，則是最近分析《婦女雜誌》整體科技傳播實踐的代表；[10]陶、章二人皆以期刊文章分類的量化統計方法爲主，分析不同學科知識刊登的比重以及長期變化。章梅芳並特別以性別研究的角度切入，考察《婦女雜誌》文本內交織的性別話語與科技話語，藉以分析其中反映的社會性別觀念。以上研究都觀察到，不同時期的科技報導內容在數量和觀點上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例如章梅芳將《婦女雜誌》的科技傳播過程劃分成「保守改革」（1915-1919）、「激進革命」（1920-1925）、「回歸中庸」（1926-1931）三個階段，[11]大致符合前後三位主編王蘊章、章錫琛（1889-1969）、杜就田的任期，也與過去學者劃分的時期類似。[12]

前面提到，包括《婦女雜誌》在內的許多商務期刊，在五四時期遭遇嚴厲批評，被崇尚新思潮的青年讀者視爲守舊落伍的刊物。爲了因應輿論並挽救慘跌的銷量，商務在 1920 年前後對旗下期刊發起重大改革，大幅更換編輯人員，同時改變了雜誌的調性，[13]《婦女雜誌》自然不例外。從雜誌創刊起就長期擔

9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45-168。

10 陶賢都、艾焱龍，〈《婦女雜誌》與中國近代的科技傳播〉，《中國科技期刊研究》，卷 24 期 6（2013 年 11 月），頁 1227-1230；章梅芳、李倩，〈《婦女雜誌》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啓蒙〉，《婦女研究論叢》，期 137（2016 年 9 月），頁 57-67。

11 章梅芳、李倩，〈《婦女雜誌》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啓蒙〉，《婦女研究論叢》，期 137，頁 59。

12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 (November 1984), pp. 37-55. 當然《婦女雜誌》歷年來的主編不只這三位，只是他們的任期較長；見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58，表一。

13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頁 92-113。

任主編的王蘊章，是被沈雁冰（茅盾，1896-1981）批評為「屬於當時封建思想的舊文人一類」的人物。[14]王蘊章在壓力下嘗試部分改革，然而仍不甚成功，最後在 1920 年 11 月同時辭去《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主編職位。《婦女雜誌》隨後由章錫琛接手。據章錫琛回憶，商務對《婦女雜誌》「一向並不重視」，只求換人「把提倡三從四德、專講烹飪縫紉的老調變換一下」。[15]章錫琛主編時，雜誌的風格劇變，大談婦女解放議題，成為新文化思潮下婦女解放運動的旗手。乍看之下，王蘊章時期是「封建守舊」的；然而前人研究均指出，《婦女雜誌》前七卷（1921 年以前）介紹科技知識的部分佔整本期刊比重較大。[16]換句話說，王蘊章時期的《婦女雜誌》反而刊登較多通俗科學文章。雖然研究者也多指出，這時期的《婦女雜誌》是以保守的賢妻良母主義為宗旨，講求以科學改良家政，因此在題材選擇和撰述上注重實用性強的醫藥、衛生、家政學等領域，關注的範疇不脫離家庭。[17]值得思索的是：為何「舊派」文人王蘊章主持下的《婦女雜誌》，在科學內容編撰的比例上，不遜於改革後呼應進步思潮的章錫琛時期？

本文即以編者的角度為主，討論《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學報導內容與相關的文化脈絡。討論的年代斷限為 1915 年至 1919 年間，也就是雜誌前五卷的內容；這是由於商務在 1920 年初已開始因應輿論改革，雖然王蘊章到該年底才離職，但編輯風格上不免已和此前有所區隔。筆者認為，王蘊章以及此時期曾參與編輯的胡彬夏（1888-1931），皆屬於清末民初之際以溫和漸進

---

14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上冊，頁 135。

15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16。

16 陶賢都、艾焱龍，〈《婦女雜誌》與中國近代的科技傳播〉，《中國科技期刊研究》，卷 24 期 6，頁 1227；陳靜、姜彥臣，〈《婦女雜誌》研究述評〉，《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5 期 4（2015 年 7 月），頁 11。

17 章梅芳、李倩，〈《婦女雜誌》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啓蒙〉，《婦女研究論叢》，期 137，頁 60-61；陳靜、姜彥臣，〈《婦女雜誌》研究述評〉，《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5 期 4，頁 11。

模式啓蒙的一批「過渡」知識分子，[18]他們的編輯志趣對《婦女雜誌》前期的通俗科學內容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又以王蘊章最爲關鍵。胡曉眞曾用「知識的小道化」及「微物崇拜」二個層面，來形容王蘊章主持《小說月報》時對於寫作與編輯事業的志趣：前者爲鎔鑄知識及娛樂於一爐的偏好；後者是重視零碎資料的搜羅和筆記。[19]王蘊章這二種取向，其實也適用於他同時主持的《婦女雜誌》。他在《婦女雜誌》中採用的各式趣味科學集錦，以及用通俗小說形式來介紹科學常識的作品，正是上述二種取徑的體現。此外，從王蘊章對讀者投書的回應可以看出，他用科學改良家政的理念，除了承襲清末以來常見的開民智、興實業一類「救亡圖存」的啓蒙論述，亦包含其對個人與家庭日常生活的關懷。此類重視日常知識、科學與日常生活關聯性，以及新式科學化生活中的女性的出版品，在晚清民初大量出現。季家珍（Joan Judge）提出以「日常性」（Everydayness）爲範疇來分析這類文本，並認爲這種以個人、家庭及地方性爲著眼的日常生活倡議，在當代刊物中的顯著性不亞於晚清、五四知識分子慣常以國族振衰起敝爲基調的宏大啓蒙論述，兩者並經常交織混雜。[20]五四前在王蘊章主持下的《婦女雜誌》所呈現的通俗科學內容，就是此類日常生活倡議的體現。

近年來，學界在討論晚清民初中國思想、文化與社會的劇烈變遷時，皆意識到新式傳播在其中推波助瀾的關鍵角色。新式傳播以報刊與出版業爲核心，在技術上引入印刷的機械化，在經濟上則有結合了龐大資本及專業人才的商業文化機構崛起。「期刊」作爲最具代表性的新傳播形式，對於知識社群的建構、

18 「過渡」知識分子的概念，參見許紀霖，〈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收入氏著，《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79-87。另外，張灝提出的「轉型時代」概念，也與過渡知識分子有異曲同工之妙；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 37-60。

19 胡曉眞，〈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2006 年 3 月），頁 55-89。

20 Joan Judge, "Everydayness as a Critica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The Case of *Funü shibao* (The Women's Eastern Times),"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0（2012 年 12 月），頁 1-28；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8-11.

知識與思想在社會大眾之間的散布，發揮舉足輕重的功效。[21]無獨有偶，西方科學史學界在討論現代科學的發展歷程時，也注意到「通俗科學」（popular science）傳播在社會與大眾文化上的意義，[22]尤其對於十九世紀英國的案例研究已累積了豐碩的成果。[23]學者特別指出，綜合性商業期刊對普及科學知識的功效不容小覷：它們的發行量大、流通廣，能觸及不同階層群眾，滲透範圍勝於書籍、演講與專門性同人期刊。在一般大眾商業期刊中的通俗作品，除了談論科學新知的報導，也有題旨非關科學、卻提及相關人事物及概念的文章或小說。比起專門刊物，它們的描繪更能反映科學在時下流行文化中的表現，以及社會大眾對科學的認知。[24]同理，研究《婦女雜誌》之類的非專門刊物，也有助瞭解通俗科學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過程中的變遷與意義。

本文首先從文章分類統計的方式出發，全面檢視《婦女雜誌》前五卷科學內容的學科範疇。賢妻良母主義是此時期的雜誌宗旨。在此影響下，醫藥衛生、家政這二大類題材，固然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佔大宗，但理化、生物學等類別的文章在質量上仍不可小覷。特別是許多談論兒童教育、婦女職業與婚姻的文章，雖然題旨沒有直接與科學相關，卻時常引用當時流行的科學理論或詞彙。筆者接著以胡彬夏、王蘊章二位主編爲中心，分析五四前《婦女雜誌》通俗科學編撰的脈絡。尤其是王蘊章注重實用及趣味的編輯志趣，深刻影響了此時期《婦女雜誌》的面貌，包括大量的科學內容和家庭常識題材的選擇。而胡彬夏

21 李仁淵，〈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3-49。

22 “Popular science” 有二種層面：其一是以淺近的語言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即所謂的「科學普及」或「科普」；其二是在大眾文化中所表現的科學。然而以上實踐及意涵也會隨時代不同而有差異。爲避免與一般認知的、在今日語境中習慣稱呼的「科普」混淆，本文將歷史脈絡中的此類實踐稱爲「通俗科學」。

23 例如：Bernard Lightman, *Victorian Popularizers of Science: Designing Nature for New Aud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James Secord, *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4 Sally Shuttleworth and Geoffrey Cantor, “Introduction,” in Geoffrey Cantor and Sally Shuttleworth, eds., *Science Seri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Scien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Periodica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4), pp. 1-15.

鮮明的教育主張與社會意識，也相當程度反映了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女權聲浪。筆者並進一步闡述當代過渡知識分子對家政的重視，並非侷限於家庭視野，而有更深層的社會改革意義。最後，通俗科學不免觸及科學領域邊界的模糊地帶，牽涉超能力等爭議的題材，在《婦女雜誌》也偶爾可見。它們反映當代西方「科學」複雜多元的面貌，也揭示王蘊章等時人的知識觀。

二、賢妻良母觀念下的科學類別綜覽

五四前的《婦女雜誌》是以提倡賢妻良母為宗旨。[25]「賢妻良母」這個看似中國傳統早有的詞彙，事實上是日本明治初期才創建的和製漢語。明治初期的啓蒙思想家中村正直（1832-1891），受西方文化影響而提倡「善母」以教育兒童，陶冶健全的人格，可視為明治啓蒙「賢妻良母」思想的濫觴。然而明治中期以後，在女子教育制度化的過程中，賢妻良母論述的內涵轉變，成為在國族主義與男女分工的框架下，強調女子在家庭中為人妻母的天職與相應的溫良貞淑秉性，即為國家、家族服務的所謂「賢妻良母主義」。[26]清末在中國開始盛行的賢妻良母論述，就受到日本明治啓蒙不同內涵的賢妻良母思潮影響，呈現既西化開明又國族保守的複雜面貌。[27]總之，自清末維新派以降，有志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多認知到身心健全、具備現代知識的婦女才能孕育強健的國民，故需推廣女子教育以救國保種。這樣的意見在《婦女雜誌》以及同時期的其他女子期刊如《婦女時報》（1911-1917）皆經常出現。因此在肯定興辦女學、鼓勵婦女自傳統陋習的束縛解放之餘，賢妻良母論者也多強調婦女在國家及社會群體中的責任。例如邵飄萍（1886-1926）撰文表示：「女學生者，

25　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38；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頁 47-55。

26　賢妻良母思想在東亞範圍的流變，主要參考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5）。

27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71-76。

固國家組成之一分子，亦社會組成之一分子也。既以將來之賢妻良母爲期，則將來國家社會之責任，女學生實與男子分任其半者也。」[28]胡彬夏論及主婦治理家庭之重要性，也著眼於家庭「爲社會、能分勞，并爲其代表」的功能。[29]

在賢妻良母論述廣泛影響下的《婦女雜誌》，究竟提供了讀者哪些範疇的科學知識？雖然前人研究已指出，此時期《婦女雜誌》的科技傳播集中在與家庭相關的實用題材，然而卻缺乏全面的數據統計作爲分析參考。例如周敘琪討論《婦女雜誌》的內容變化，以不同文章項目在每期平均刊登篇數來佐證；葉韋君則針對讀者通信，統計各種議題的歷年分布。但二者的統計皆簡略，分類項目則偏重在女子教育、婚戀及生育等女性議題上。[30]章梅芳列舉不同時期科學文章的學科領域比重，但僅簡單區分爲醫學、農學、工學及理學等項目。章還另外對 1920 年後的醫學知識文章作細部分類，1919 年以前的統計卻闕如，且僅含生理學、兒科及婦科等醫學分類項目。[31]由此可見，有必要針對《婦女雜誌》前五卷內的科學文章進行全面分類普查。

本研究依照文章題旨或內文涉及的領域，將《婦女雜誌》前五卷的通俗科學內容分類。這些通俗科學內容大致可分成二種：其一是介紹科學知識的文章，即一般認知的科技傳播；其二是內容引用科學概念、人物或抒發個人心得的文章，例如參訪展覽的經驗。在此對科學採用較廣義的解釋，亦即除了自然科學以外，技術、醫學、教育之類偏重應用的範疇也一併考慮。所有通俗科學文章被歸納爲「數學」、「理化」、「地球科學」、「生物」、「醫藥衛生」、「實用家政」、「教育」、「科技發明」、「其他」這九大類（細節參見附表

28 飄萍女史，〈理想之女學生〉，《婦女雜誌》，卷 1 號 3（1915 年 3 月）。

29 彬夏，〈美國家庭〉，《婦女雜誌》，卷 2 號 2（1916 年 2 月）。

30 周敘琪，《一九一０～一九二０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爲分析實例》，頁 154；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頁 92，圖 1。

31 章梅芳、李倩，〈《婦女雜誌》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啓蒙〉，《婦女研究論叢》，期 137，頁 63 表 1；頁 64-65，表 2。

1）。[32]凡是題旨與以上範疇相關的篇目，無論其形式爲散文、韻文、小說、讀者通信、圖畫或照片，都在統計的範圍。須注意的是本研究統計不包括廣告。

以上分類統計難免有困難或爭議。[33]有些文章內容涵蓋多種類別的議題，例如談蚊蠅與衛生防疫的文章，常兼有「生物」及「醫藥衛生」二類內容，爲了避免重複統計，只能依文章題旨或是在文內所佔比重選擇歸類其一。此外，不少文章是以連載形式刊登，即一部作品分成數篇刊載在不同期；例如陳世宜〈日用理化學淺話〉，[34]連載於第一卷的第一至四號與第六號。連載的內容可能變化，例如第一卷第六號的〈日用理化學淺話〉主題是食物，牽涉到人體生理學及營養學等知識，是前面幾篇未有的。爲了統計方便，筆者將不同期的連載視爲獨立的各篇，依各篇內容決定分類，不一定與別期的連載相同。

附圖 1 即是《婦女雜誌》前五卷不分類別的整體科學內容逐月（期）的分布，分別用篇數、佔該期全部篇目百分比來表示。可以看出，第三至五卷（1917-1919）的科學內容與前二卷有明顯的分野。這三卷的科學文章篇數很多，每年佔全卷篇目比例也都維持在 40%以上，換句話說，每期雜誌經常有三至四成以上的內容與通俗科學相關。相較之下，胡彬夏主編的第二卷科學文章篇數明顯減少；王蘊章主編的第一卷，也許因創刊階段仍在摸索刊物方向，在科學內容的表現上與同樣由他主持的第三至五卷有明顯差異。整體來說，王蘊章時期的科學篇幅比胡彬夏主編時還多。

32 筆者在此用的分類是據現今通用的科學領域，有抽象邏輯的形式科學，即「數學」；以實證方法研究自然現象的自然科學，包括「理化」、「地球科學」、「生物」；另外由於此時期的《婦女雜誌》有大量談論實用技藝的內容，考慮現實狀況，設置「醫藥衛生」、「實用家政」、「教育」、「科技發明」這些以應用技術層面爲主的分類。

33 筆者坦承任何分類都難免牽涉自由心證的判斷。個別樣本的確可能因分類爭議造成誤差，然而在統計樣本數量有相當規模的情況下，整體誤差範圍不至於大到能左右結論的程度。況且分類量化統計只是本文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協助吾人了解《婦女雜誌》科學內容輪廓的手段，並不是本文的主旨與最終目的。關於圖書書目分類量化統計的困難，已有許多出版史研究者說明，例如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 83-84；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93，註 2。

34 陳世宜，〈日用理化學淺話〉，《婦女雜誌》，卷 1 號 1-4、6（1915 年 1-4、6 月）。

若檢視個別分類的表現，由附圖 2 及附圖 3 可知，「醫藥衛生」無疑是通俗科學內容中篇數最多、佔整體比例最高的類別，尤其在第三及第四卷居高不下（分別是 39.6%、41.2%）。當時中國民間衛生常識低落，亟待提昇；提倡衛生保健及防疫知識，除了有迫切的需求，也延續清末以來開啓民智、破除迷信的論述。例如在此時期經常發表醫藥文章的朱夢梅（梅夢），談起時下流行的霍亂疫情，也感嘆即便是「最文明開通的上海」，雖然各處醫院救活許多病人，大部分居民「總以爲有瘟神疫鬼下降，一定要禳解禳解」。他編撰了一篇防霍亂的談話，就是認爲通俗教育刻不容緩，「倘得肯照著我的話兒做去，似乎比打醮禳疫有益些」。[35]大城市上海尚且如此，鄉村民眾更難獲得良好醫療照護或教育。因此《婦女雜誌》有許多醫藥衛生篇幅談到常見疾病的知識，有些詳細解釋病菌、病媒與人體生理等病理機制；有些則羅列處置方式，包括症狀、療法與適合的中西醫藥處方。[36]後者尤如可按圖索驥尋找答案的家常醫藥知識指南——事實上的確有讀者希望瞭解更多詳情，來函詢問疑難之處，或何處能購得所列藥方。例如浙江杭州的宋式陶詢問熟地、黃連二種處方的服用方法，以及其他調經的善方；江蘇高郵的秦達九則期望文章內所用藥品皆能附上英文，以方便查找實驗。[37]又如肺結核染病後往往長期折磨患者，經年不癒，從許多時人的回憶錄皆能窺見癆病的盛行和致命程度。[38]奉天安東縣姚書翰便在閱讀《婦女雜誌》醫藥文章後，來信表白自幼體弱，八年前便患肺結核迄今，雖然經縣內滿鐵日本醫院治療後病勢遏止，仍然「咯血痰嗽各頑症」不癒，因

---

35 朱夢梅，〈霍亂預防講話〉，《婦女雜誌》，卷 5 號 10（1919 年 10 月）。

36 前者例如錫華，〈家庭傳染病豫防法〉，《婦女雜誌》，卷 1 號 8-10（1915 年 8-10 月）；胡宗瑗，〈癆菌之毒害及其預防法〉，《婦女雜誌》，卷 5 號 10（1919 年 10 月）。後者例如朱夢梅，〈簡易療病法〉，《婦女雜誌》，卷 2 號 1-7（1916 年 1-7 月）。

37 宋式陶來鴻見〈通信問答〉，《婦女雜誌》，卷 3 號 10（1917 年 10 月）；秦達九通信見〈來鴻去雁〉，《婦女雜誌》，卷 1 號 9（1915 年 9 月）。

38 例如作家包天笑回憶童年，謂當時蘇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親人不知趨避，互相傳染。包天笑的某位塾師就是因肺癆而死。見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頁 42-43。

此詢問其痼疾有無治癒的希望，信中語氣十分懇切。[39]以上通信都顯示了《婦女雜誌》醫藥類文章受讀者的矚目以及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醫藥類文章，儘管以西方科學與西醫學理爲主，對於傳統中醫卻不排斥，尤其是關於中藥的知識。這種兼容並蓄的態度可以從上述讀者投書詢問中藥處方看出。王蘊章談肺結核治療的〈難病之治療法〉，就將中醫的灸法也列入其中，並舉日本的醫學研究來說明其成效。[40]朱夢梅〈家庭藥物學〉包羅萬象，以家庭或街坊藥房容易取得之藥材爲準，甚至有牛奶、醋、雞蛋等家常食物。在西藥之外，〈家庭藥物學〉也收錄超過二十餘種「最普通而有實效」之中藥，例如遠志、大黃、地黃、防風、茯苓等。然而朱夢梅在例言說明「所採各種中藥，學說均本西洋」，[41]還是以西醫學理爲基礎來解釋，不時點出小道偏方的謬誤。例如在介紹遠志時，謂「遠志入藥用根，李時珍謂此藥服之能益智強志」，後世因而流傳在丁酉日密服遠志能使人變聰明的說法。朱夢梅諷刺：「果能如是，我國愚妄之人極多，若均以此法治之，全球人類當推我國爲獨智矣。有是理乎？總之，遠志有益智之說，實屬不根之談」，[42]字裡行間仍時時以破除迷信爲念。

將專門學問轉化成通俗知識並普及，在實務上常須顧慮大眾接受的程度，尤其是翻譯外文原著，往往得兼顧本國民情作適當調整，否則即使翻譯得正確無誤，讀者仍然可能無法領會。這種將外來科學知識「本土化」的努力，在《婦女雜誌》裡不乏例子，尤其是醫藥類文章特別明顯。例如朱夢梅指出，西醫配藥用的單位是 Gram（約合我國秤量二分六釐餘）或 Grain（約合我國秤量一釐半），與中醫不同；爲了方便中國家庭習慣使用，在寫作上無論中西藥全採用戥子秤重的兩、錢、分、釐這些傳統單位來計量。[43]另一篇翻譯英國醫生談蚊蟲與瘧疾的文章，提到以阿摩尼亞或鹽酸等化學藥品加入水中來撲滅病媒蚊

39 〈復奉天安東縣誠文信書坊姚墨卿信〉，《婦女雜誌》，卷 3 號 5（1917 年 5 月）。
40 西神，〈難病之治療法（續）〉，《婦女雜誌》，卷 5 號 10（1919 年 10 月）。
41 朱夢梅，〈家庭藥物學〉，《婦女雜誌》，卷 3 號 1（1917 年 1 月）。
42 朱夢梅，〈家庭藥物學（續）〉，《婦女雜誌》，卷 3 號 10（1917 年 10 月）。
43 朱夢梅，〈家庭藥物學〉，《婦女雜誌》，卷 3 號 1。

蟲，譯者便註解說明原著是爲備稍具醫學常識者而作，故未載明應用分量；然而「我國人缺乏醫學常識者極眾，如欲試用上述方法，宜斟酌而行，始免危險」，避免讀者依樣畫葫蘆而誤用。譯者並以自身所知補充，「最妥而最省金錢之法，莫如用石灰」。[44]

家庭爲衛生保健的基層前線，婦女作爲持家、護理的角色，也時常在醫藥衛生文章中被突顯。例如沈芳在創刊號中表示國人衛生智識幼稚，期望知識能普及於人人，而「吾儕爲女子者，急於此時盡其天職，使衛生之學及侍病之法日益精進，以裨益於社會」，[45]將衛生保健與侍病視爲女性天職。朱夢梅也強調性別角色差異，在〈簡易家庭看護法〉開宗明義表示「女子最宜於練習看護」。他以爲「男子性質常粗率疎忽，不若女子之綿密周緻」；況且「女子既爲一家之主婦，若於看護方法，昧然不知，則家族中偶有疾患，必致手足無措。其甚者輕信人言，醫藥雜投，尤易釀成大患。」[46]這裡所體現的並非男尊女卑的傳統父權思想，而是賢妻良母論中的性別分工觀念：由於男女生理與心理上天分的差異，因此有不同的活動領域和天職。[47]除了衛生護理外，生育也是婦女的重要天職；育兒的相關知識，從妊娠、生產、哺乳乃至嬰孩照護，皆是《婦女雜誌》醫藥衛生類常出現的題材。沈芳在創刊號的〈婦女衛生談〉，就從月經、妊娠及分娩的衛生談起，以及在經期和妊期如何護理身體。清末民初之際在坊間流傳介紹婦科衛生知識的專業醫書很多，但在綜合性商業雜誌上討論月經等女性身體及生理現象，《婦女雜誌》可說開風氣之先。[48]

家政類的實用技藝，在通俗科學內容中篇幅僅次於醫藥衛生。附圖 2、附圖 3 顯示，家政類文章在王蘊章主編時最多，尤其在後三卷逐年增長。此類文章大致可區分爲二種面向：其一是實際技藝的教學，包括論花木栽種的園藝

---

44 英國 Dr. T. Frederick Pearse 原著，玄甫、拾塵同譯，〈蚊蟲與瘧疾（續）〉，《婦女雜誌》，卷 5 號 11（1919 年 11 月）。

45 沈芳女士，〈婦女衛生談〉，《婦女雜誌》，卷 1 號 1（1915 年 1 月）。

46 梅夢，〈簡易家庭看護法〉，《婦女雜誌》，卷 1 號 3（1915 年 3 月）。

47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18-22、表 1。

48 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頁 127-128、137-138、200。

學、家禽牲畜養殖的方法、烹飪飲食須注意的營養學，以及與家庭相關之傳統或現代工藝。學者指出，這些內容大多與傳統農業社會日常生活的食、衣、住等項目相關，重點在於加入西方科學知識來改良，或者系統性整理方法使治家技藝成爲專門學問。[49]另一種面向，則是家政學的原理。現代家政學源自十九世紀後期在美國興起的女子教育改革運動，主張把家庭生產與消費活動科學化，因此其原文「家庭經濟」（home economics）即有經營管理之意涵。[50]而在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考察歐美女子教育，也嘗試在賢妻良母論的基礎上建立有東洋特色的家政學與家政教育，其中最知名的代表就是下田歌子（1854-1936）。下田提倡的婦女教育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大。[51]《婦女雜誌》中談家政原理的文章，不少翻譯自英文或日文著作，呈現美、日學說齊鳴的盛況。[52]有趣的是，雖然《婦女雜誌》第二卷主編胡彬夏曾受業於下田歌子門下，也提倡主婦治家之重要性，其任內的家政類文章比重卻大幅減少，從前一年的 23.3%驟降至 8.9%。

比起家政學，胡彬夏更加關切的領域是教育。雜誌第二卷的教育類文章大幅增加，不但數量從前一年的 8 篇增加到 27 篇，在通俗科學整體內容所佔的比例也上升到 21.8%，緊追排名首位的醫藥衛生類。教育類文章的提升與胡彬

49　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爲例〉，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233-251；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卷 43 期 3（2005 年 9 月），頁 107-190；周敘琪，〈家庭經濟與現代主婦——邵飄萍譯介《實用一家經濟法》析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1-50；章梅芳、李倩，〈《婦女雜誌》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啓蒙〉，《婦女研究論叢》，期 137，頁 60-61。

50　有關家政學早期在美國的發展，參見 Carolyn Goldstein, *Creating Consumers: Home Economist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pp. 1-4, 21-61. 另外，二十世紀初的英華字典中，Economy 這個字彙的釋義也包括家政、管理、家務；例如顏惠慶編，《英華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頁 718。

51　Mamiko Suzuki, “Shimoda’s Program for Jap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2 (June 2013), article 3, pp. 1-9;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77-96；羅秀美，〈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單士釐的「女性文學」〉，《漢學研究》，卷 32 期 2（2014 年 6 月），頁 197-230。

52　譯自英文著作者例如宗良，〈主婦之治家法〉，《婦女雜誌》，卷 4 號 6（1918 年 6 月）；譯自日文者例如邵飄萍，〈實用一家經濟法〉，《婦女雜誌》，卷 1 號 8-12（1915 年 8-12 月）。

夏的學經歷背景關係重大，筆者在下一節詳述。《婦女雜誌》重視教育類文章的風氣在胡彬夏之後仍然延續；王蘊章在後三卷也刊登許多教育類文章，雖然在比例上降至 10%~15%。許多教育類文章反映「科學化」的時代潮流，援引人體生理學、心理學、優生學等科學理論來佐證其論述。例如朱宗良（1891-1970）翻譯美國醫生霍格（Ernest Bryant Hoag，1868-1924）提倡「父母教育」的著作，就是當時流行的優生學改良人口素質的思想；[53]汪集庭談嬰幼兒教育，則從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腦部發育與心理變化著眼。[54]

自然科學在五四前的《婦女雜誌》也據有重要地位，其中「生物」和「理化」是佔整體比例較高的二個類別：生物類長期在 5%~10%間穩定徘徊；理化類在第一卷甚至超過 20%，僅次於醫藥衛生和家政，雖然此後三年逐年下滑。以上數據雖然不如醫藥衛生和家政亮眼，然而《婦女雜誌》的文章題材經常橫跨多種領域，以家政類文章來說，也往往牽連自然科學知識。例如談烹飪技術，即會從物理學的熱脹冷縮原理、金屬材料的化學性質，來討論適當廚具的選擇；又如談衣物洗滌、染整及收納，也多從布料纖維的物理特性、染料的化學成分等科學角度切入。[55]至於生物相關的報導，若談動物，題材常常是蚊、蠅、老鼠、寄生蟲等病媒或病原，兼顧衛生防疫知識；若談植物，則大多牽涉園藝學實務。上述因素，使得理化及生物相關的內容在統計上容易被劃歸於其他類別，即使乍看比例不高，仍不可小覷自然科學潛藏的分量。

許多生物類的文章也鼓勵讀者實地動手體驗。西方傳統上認為博物學——尤其是植物學——是適合女性從事的科學，女性從事植物標本採集或相關的通

53 宗良譯，〈人種改良與父母教育〉，《婦女雜誌》，卷 4 號 5（1918 年 5 月）。霍格是內科醫生，醫學院畢業後在加州帕沙迪那（Pasadena）執業，並在加州多所學校教授醫學等課程，著有多部關於兒童衛生與心理學、犯罪學的著作。

54 汪集庭，〈自然教育淺說〉，《婦女雜誌》，卷 4 號 6、9（1918 年 6、 9 月）。

55 遐珍，〈關於烹飪之理科談〉，《婦女雜誌》，卷 1 號 5（1915 年 5 月）；陸詠黃，〈家事衣類整理法〉，《婦女雜誌》，卷 2 號 9、10、12；卷 3 號 2-6（1916 年 9、10、12 月；1917 年 2-6 月）。

俗寫作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蔚為風尚。[56]中國傳統文人及閨秀也有類似西方博物學的實踐，閱讀《爾雅》、《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等典籍來認識自然風物，直到晚清依然盛行。[57]《婦女雜誌》內推廣博物標本採集與園藝實作的文章，除了有實用的經濟利益外，也可視為在此一傳統脈絡下以西方科學知識重塑包裝的實踐。欣賞蟲魚鳥獸和蒔花養草，不但有益於生活，也能作為女性接觸科學的入門。以佩芬〈家庭博物館〉為例，作者詳盡解說昆蟲與植物標本的採集、製作及保存方法，也列舉博物學採集的好處：能養成「對於自然物之觀察力」；「既吸新鮮之空氣，又促血液之輸暢」，益於身體健康；採集回來之標本亦能用於家庭教育，「取標本以供玩具，兒童之常識以增」。[58]湖南瀏陽讀者李王采南，則分享其野外觀察經驗，說婚後隨丈夫在山上結廬，「其地固多礦產，又石罅巉巖，淺者數丈，深者不可測。秉炬窮探，知巖石層疊，其質以次而異。此外生物與耳目朝夕相接者，留心察之，皆足增人知識，啓人興趣」。[59]從這些敘述能辨識出一種鮮明的新時代啓蒙女性形象：既好奇於周圍生活，也好學於自然知識，懂得親近科學以改善自身與家庭，有別於女子不出閨閣、無才是德的刻板形象。

三、重視教育的「女界明星」胡彬夏

五四前的《婦女雜誌》實際上歷經二位主編：除了王蘊章外，當時知名的女教育家胡彬夏也曾主持第二卷（1916 年）。雖然胡彬夏擔任主編時間不長，她任內卻執筆貢獻不少關於社會與家庭改革的論述，加上對女子教育的重視，

56 Ann Shteir, "Gender and 'Modern' Botany in Victorian England," *Osiris* 12 (1997), pp. 29-38; Anne Secord, "Botany on a Plate: Pleasure and the Power of Pictures in Promoting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cientific Knowledge," *Isis* 93:1 (March 2002), pp. 28-57.

57 例如周作人提到他從小對生物學的興趣，就源自《毛詩》、《爾雅》諸圖以及《花鏡》之類的舊書。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下冊，頁 825。又如《婦女雜誌》一位女性讀者李王采南，也自述「余早歲就傅，於《毛詩》《爾雅》所列物類，曾事鑽研」。見李王采南，〈田螺之寄生蟲〉，《婦女雜誌》，卷 5 號 12（1919 年 12 月）。

58 佩芬，〈家庭博物館〉，《婦女雜誌》，卷 1 號 5（1915 年 5 月）。

59 李王采南，〈田螺之寄生蟲〉，《婦女雜誌》，卷 5 號 12。

刊登了許多引介西方教育理論的文章，在編輯風格上呈現出與王蘊章略爲不同的特色。她放洋留學的背景，也與科舉出身的王蘊章呈現鮮明的對比。

胡彬夏來自江蘇無錫的一個仕紳望族：祖父胡和梅（1840-1912）在清末曾任江蘇省桃源縣教諭；父親胡壹修（1865-1931）與叔父胡雨人（1867-1928），在地方上熱心興辦新式教育與女學。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或許更有名的，是她的兄弟胡敦復（1886-1978）、胡明復（1891-1927）與胡剛復（1892-1966）；三兄弟皆負笈美國留學，日後在民國科學界與杏壇皆有所成就。[60]在這樣注重教育的家族風氣下，胡彬夏得到當時女子少有的教育栽培。她幼年即入蘇州景海女學就讀，後來負笈日本留學，受業於下田歌子主持的實踐女子學校。然而胡彬夏在日本僅居留二年，其日後回憶亦認爲當時年幼無識見，「所感覺者大都係事物之表式」，[61]她受日本教育的影響其實較淺。

影響胡彬夏至深的是她的留美經驗。1907 年胡彬夏考取官費留美，成爲中國最早赴美的女留學生之一。她抵達美國後，先在波士頓近郊的「胡桃山女塾」受大學預科教育，二年後入學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留美期間，胡適（1891-1962）曾往訪胡彬夏，並在日記內稱讚她「聰慧和藹，讀書多所涉獵，議論甚有見地，爲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62]胡彬夏在美國共待了七年，獲得學士學位後於 1914 年返國。她日後在各種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經常透露其對於美國留學生活點滴的感受與眷念。

在當時的中國，像胡彬夏這樣受過西方大學教育的女子屈指可數，自然受到各界關注。她在美國時就奉教育部委任爲「萬國幼兒幸福研究會」的代表，赴華盛頓開會；返國後任教於吳江同里麗則女校與浦東中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

60 胡敦復是數學家，創建上海大同大學；胡明復是中國科學社的創辦人之一，參與機關刊物《科學》雜誌早期編務；胡剛復是物理學家，曾任職於東南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等所機構。關於此三人生平的文獻頗爲豐富，在此不贅述。另外，胡氏宗親與其故居江蘇省無錫市村前村，近年也成立「胡雨人研究會」，蒐集保存胡氏家譜與相關文史資料，參見：http://www.huyuren.com/（2018 年 6 月 26 日檢索）。

61 胡彬夏，〈美國胡桃山女塾之校長〉，《女子雜誌》，卷 1 號 1（1915 年 1 月），頁 20。

62 此則記於 1913 年 10 月 12 日，見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冊 1，頁 243。

商務延聘胡彬夏爲主編，就是借重其「女界明星」的名聲來宣傳號召讀者；[63] 雖然亦有時人批評胡彬夏僅爲掛名，實際主持者仍是創刊時的主編王蘊章。[64] 然而從雜誌第二卷新增社說、通信等欄，加上胡本人頻繁發表對女界議題的意見來看，胡彬夏有鮮明的主張和作爲，不僅是虛位的掛名主編。不過王蘊章在第二卷仍持續撰稿，而且雜誌的文苑、雜俎及餘興等欄維持一貫的文藝風格，因此這時候的《婦女雜誌》仍舊保有王蘊章的影子。這可能是由於王蘊章在商務資歷較久，對編輯實務較熟悉，因此沒有完全抽離《婦女雜誌》。第二卷的《婦女雜誌》實可視爲胡彬夏與王蘊章共同編輯的成果。

胡彬夏擔任主編的時間僅有一年。依現有資料無法確定她離開商務的原因；商務經理張元濟（1867-1959）在其日記中，僅簡短記載「胡彬夏年終解約，改用投稿報酬」，[65]從這個「臨時協議」可以推測胡彬夏的去職並非在計畫中。或許雜誌編輯對於胡彬夏來說並非其志，她更傾向在社會上活動——在接下來十幾年的生涯中，胡彬夏陸續擔任許多團體與機構的高層職務，包括女青年會董事長、上海婦女參政會董事、上海婦女俱樂部部長、北平萬國婦女會會長，以及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董事等職。[66]

胡彬夏對《婦女雜誌》的最大改變，就是提升教育類文章的分量。前面的統計分析已經提過，她主編的第二卷裡的教育類文章大幅增加。胡彬夏在《婦女雜誌》發表的第一篇社論，便闡釋她對於女子教育的理念，認爲女子教育宜「先博後專，而後其所專能高，而後眞能切實有用焉」；她不滿時下女子學校常見的國文、修身、烹飪、裁縫、唱歌、體操等分科，認爲「人生問題至複雜」，上述專科技藝雖爲「切實有用之科」，但無法解決人生問題，不是新時代女性

---

63 〈婦女雜誌大改良廣告〉，《婦女雜誌》，卷 1 號 12（1915 年 12 月）。

64 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頁 38；另參見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頁 61，註 24。

65 此則記於 1916 年 11 月 17 日，見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上冊，頁 138。

66 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名人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頁 170；〈朱胡彬夏女士舉行葬儀〉，《女鐸》，期 20 冊 9（1932 年 2 月），頁 80。

需要的學問。因此她擬於《婦女雜誌》學藝門中漸添置「天文、地質、森林……教育、心理、哲學、文學等科，又新設中外大事記一門，所以廣見聞、增學識，以爲吾國二十世紀新女子之先導也」。[67]胡彬夏的主張明顯受到美國大學注重通識的博雅教育理念影響，與她在美國留學的經驗息息相關。這也解釋了爲何她大量減少實用技藝教學一類的家政文章，把空間留給教育類。胡彬夏十分留心西方教育學說的潮流，尤其推崇義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的兒童教育法，在她主持下有許多蒙特梭利其人其事與教育理論的報導。[68]

然而胡彬夏在學藝門一欄添置各種學科的理想，除了教育類文章明顯增加外，其餘終究沒有實現。這可能是由於她提早離開商務，來不及將改造雜誌的理念付諸實行。不過《婦女雜誌》的教育類文章在胡彬夏之後仍然維持顯著的分量，無論是王蘊章還是五四後的章錫琛，都刊登了許多談論女子與兒童教育的論述。這除了由於《婦女雜誌》讀者群以學校教員及學生爲大宗之外，胡彬夏短暫主持期間造成的影響也是不容忽略的。

四、王蘊章的「家庭實用、娛樂教化」理念

作爲新時代啓蒙女性代表的胡彬夏，對《婦女雜誌》而言是具行銷價值的招牌明星。然而主編任期更長的王蘊章，對雜誌的影響更加深遠。王蘊章個人對知識系統建構的志趣及品味，是《婦女雜誌》在此時期刊載大量通俗科學內容的關鍵。欲分析雜誌科學內容，不能不探討王蘊章的個人背景。

王蘊章，字蓴農，號西神，1884 年生於江蘇無錫。[69]他成長於書香世家，父親王道平是清朝翰林，他本人則在尚未弱冠的年齡就中舉人，可謂家學淵

67 朱胡彬夏，〈二十世紀之新女子〉，《婦女雜誌》，卷 2 號 1（1916 年 1 月）。

68 例如彬夏，〈蒙得梭利教育法〉，《婦女雜誌》，卷 2 號 3-4（1916 年 3-4 月）；張菊姝，〈二十世紀之女教育家〉，《婦女雜誌》，卷 2 號 2（1916 年 2 月）。

69 對王蘊章描述最詳細的第一手資料，當屬與其本人爲忘年之交的鄭逸梅的紀錄，例如：鄭逸梅，〈詞章名手王西神〉，收入氏著，《近代名人叢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5-286。

源。和晚清民初眾多的知識分子相同，王蘊章的人生軌跡也呈現新舊並陳的面貌。一方面他受過傳統文人的訓練，精於書法、詞章，尤擅長駢文，有相當程度的國學根柢；另一方面，他熟悉英文，多次出國遊歷，曾赴南洋經商，非常留心外國新事物。王蘊章自述在辛亥革命前曾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撰稿，可見其支持革命的立場。[70]他又加入南社，積極從事文藝創作，所作多為駢體的彈詞及小說。1910 年進入商務擔任編輯，參與編纂首版《辭源》，並創辦《小說月報》。1915 年《婦女雜誌》創刊，又兼任主編，此時王蘊章年僅三十出頭，在商務編譯所內是青壯輩，正欲大展其文學抱負。可惜五四後受新文化浪潮衝擊，黯然卸下雜誌編務。他和諸多南社文人如吳恭亨（1857-1937）、陳匪石（1884-1959）等交好，這個文友圈子常互相酬唱；其中往來者，不乏周瘦鵑（1895-1968）等被新文學陣營貼標籤為「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因此後世常將王蘊章視為鴛蝶派。[71]他雖然喜好以傳統文體創作，事實上對新、舊文學並無成見，也嘗試寫過白話小說。五四後在《小說月報》革新之際，同時面臨新舊文人夾擊的壓力，頗有鬱鬱不得志與動輒得咎之感。[72]

過去學者對王蘊章的研究不多，大部分集中在他編撰《小說月報》的表現，以及將他置於鴛蝶派的脈絡下，作為新文學的對立面來討論。由於王蘊章正巧在商務革新前主持《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加上他傾向保守、同情舊派文人的作風，在茅盾、章錫琛這些高舉改革旗幟的新文化知識分子眼中，自然沒有太正面的評價。近年來，學界多有主張以「近現代通俗文學」的概念來重

茅盾回憶《小說月報》改革前後，亦有對王蘊章的側寫，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頁 134-140。另外時人關於王蘊章的報導，散見於滬上各種報紙，例如古越孫綺芬，〈呵凍識小．談小說家王西神〉，《先施樂園日報》，1923 年 2 月 20 日；朱鳳蔚，〈南社人物小誌．陳匪石王西神〉，《社會日報》，1931 年 8 月 14 日。

70 鄭逸梅，〈詞章名手王西神〉，《近代名人叢話》，頁 277。

71 例如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 126-128。

72 胡曉真，〈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頁 62-65；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頁 139。

新評估鴛蝶派文學價值的意見。[73]對王蘊章與改革前的《小說月報》，也有學者重新檢視；例如柳珊與謝曉霞討論《小說月報》於五四前後的過渡特性與轉型，反駁王蘊章是鴛蝶派的說法，認爲當時的《小說月報》其實富於多元色彩。[74]胡曉真除了討論王蘊章主編的二種期刊所登載的女性文學，也以《小說月報》中所呈現的融合傳統文化、國家意象與現實社會關懷的知識體系，來分析王蘊章的編輯志趣。[75]無論如何，以上討論仍集中在文學層面；王蘊章對於通俗科學的貢獻，少有學者進一步申論。

胡曉真所歸納出王蘊章的知識體系與編輯志趣，正好提供探討其對通俗科學理念的線索。胡曉真指出，王蘊章喜好將知識「小道化」，鎔鑄娛樂與珍奇異聞於一爐，也對於零碎資料的搜羅集錦有莫大興趣。[76]一方面，王蘊章十分熱衷西方外來知識，在《小說月報》及《婦女雜誌》屢屢刊載記錄西方風土民情的稿件，將外來知識以富有娛樂效果的方式介紹給讀者；另一方面，他對於零散片斷的本土資料，從各種民俗軼事的隨筆輯錄，到歷代具傑出技藝的才女事蹟等，哪怕是再瑣碎的微小事物，皆有拾遺蒐集的執著。例如他在主編的二種雜誌上連載，後來集結出版的《然脂餘韻》，就是蒐羅清代閨秀詩文及詳述這些女作者的軼聞掌故。[77]王蘊章這種重視累積資料進而編纂成叢的功夫，與他參加編輯《辭源》的背景不無關係，也或許受舊時代學者注重考據之學的影響，再加上本身對傳統文藝的深厚底蘊。然而像《然脂餘韻》之類的作品，在

---

73 例如龔鵬程，〈鴛鴦蝴蝶派：民初的大眾通俗文學〉，收入氏著，《中國小說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16-333。

74 柳珊，《在歷史縫隙間掙扎：1910-1920 年間的《小說月報》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頁 71-79、85-101；謝曉霞，《《小說月報》1910-1920：商業、文化與未完成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頁 73-86。

75 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鬘——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69-193；胡曉真，〈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頁 55-89。

76 胡曉真，〈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頁 77-83。

77 另外《婦女雜誌》中連載的〈玉臺藝乘〉，也是王蘊章編纂歷代有傑出技藝的女子事蹟。這些技藝除了琴棋書畫等傳統四藝外，也包括醫術、算數、天文等才學。

茅盾看來雖然不無史料價值，仍然是封建舊時代的產物，「終不免於『玩物喪志』之譏」。[78]

王蘊章這樣的風格也體現在通俗科學的編撰。他在雜誌上明白宣示對通俗科學的理念，重在「實用」及「趣味」二點。前面提到讀者丁小石來信，表示《婦女雜誌》刊載的日用常識讓他受益良多，但想與妻兒一起談論卻「微覺有不能達意之處」，就是「其中關於科學者，非婦孺所盡了解」。他因此建議雜誌能附刊普通各科淺說，無論有沒有入過學校的讀者都能獲益。[79]丁小石的來函讓王蘊章甚有感觸，於回覆中抒發自己對於編輯通俗科學的感想：

> 科學不必其甚深微精妙，惟求其適合於家庭之實用。以通俗教育為經，以補助家政為緯，務使讀者對於普通常識，不必他求而已足。而此中更有一躊躇滿志，幾費商榷而終不能自信者，則引起讀者之興味是也。……鄙意當使女報普及於一般之家庭婦女，而多載淺明有味之材料，俾讀者視之，等於一種之小說雜誌，而即引起其改良家政、增進學問之觀念，由舊家庭而嬗蛻為新家庭。[80]

由此可見王蘊章重視普及知識，期望科學能切合日常生活實用，最終目的是改良舊家庭成為具有現代性意涵的新家庭。這個理念除了反映在《婦女雜誌》學藝、家政等欄刊載的大量與家庭生活相關的長篇文章，也呈現在餘興欄特別設置的「家庭新智識」、「家庭俱樂部」等小品集。以「家庭俱樂部」為例，王蘊章輯錄各種調性輕鬆的短文，包括理科遊戲、日用品自製法、兒童故事及學生日記範作等，並聲明「此欄所列，皆切合家庭婦女之實用，其宗旨在以淺近之學說，引起婦孺研究科學之趣味，增進治理家庭之常識」。[81]任何對居家生活有幫助的體驗或常識，即便瑣碎、不明就理，只要能引發讀者興味，他也以為有記錄刊登的價值。例如有篇筆記寫如何催熟柿子、使柿子口感更佳的方

---

78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頁 135。
79 〈通信問答〉，《婦女雜誌》，卷 3 號 7（1917 年 7 月）。
80 〈通信問答〉，《婦女雜誌》，卷 3 號 7。
81 見「記者識」，西神輯，〈家庭俱樂部〉，《婦女雜誌》，卷 3 號 1（1917 年 1 月）。

法，王蘊章說是他姪女的親身實驗，但自己「不解物理，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呼籲「格物窮理之君子，倘能類舉見教，俾得彙爲一書，似亦家庭常識之一助也」。[82]

以科學輔助家政，進而改良家庭，這種觀念不獨王蘊章有，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皆屬常見，且遍及老中青各種世代。1916 年 12 月，甫自法國返華準備上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1868-1940），應邀至上海愛國女學校演說女子教育的精神。蔡元培勉勵學生以所學之新智識，應用至治理家庭上，則「必較諸未受教育者，覺井井有條」。他接著舉例：「譬如裁縫，舊時只知憑尺寸裁剪而已，若加以算學智識，則必益能精。如烹飪，舊時亦祇知當然，若加以化學知識，則必合乎衛生」。最後以求學結合女子天職作爲結論：

> 夫女子入校求學，固非脫離家庭間固有之天職也。求其實用，固可相輔而行者也。……假如授裁縫時，為之講解自上古至現在衣服之變更，有野蠻時代之衣服與文明時代之衣服，是即歷史科也；為之講解衣服之原料，如絲之產地、棉之產地等，則地理科也；衣服之裁剪，有算法焉，其染色之顏料，有理化之法則焉，是即數學理化科也；推之烹飪等科，亦復如是。寓學問於操作中，可見女學固養成女子完全之人格，非使女子入學後，即放棄其固有之天職也。[83]

比蔡元培年輕近二十歲，和王蘊章同樣是在 1880 年代出生的胡彬夏、邵飄萍等人，更不乏此類從賢妻良母論出發，注重性別分工、從日常家庭生活改革起來的努力。邵飄萍譯介日本暢銷家政著作，先在《婦女雜誌》上連載而後單行出版的《實用一家經濟法》即爲明證。[84]即使是更年輕一輩、受新文化運動充分洗禮的青年惲代英（1895-1931），也是《婦女雜誌》家政知識的熱衷讀者，從科學治家方法的實踐體現了那個時代「青年對於『現代生活』的想像和追

---

82 西神，〈物理趣談〉，《婦女雜誌》，卷 3 號 11（1917 年 11 月）。

83 原演講全文載於《東方雜誌》，卷 14 號 1（1917 年 1 月），頁 20-22；參見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臺北：國史館，1985），上冊，頁 472-473。

84 周敘琪，〈家庭經濟與現代主婦——邵飄萍譯介《實用一家經濟法》析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

求」。[85]這種精神延續到五四後，從王雲五(1888-1979)的論述可見一斑——1922年王雲五接任商務編譯所所長不久，應邀在《科學》雜誌論中學之科學教育，其中即包含家庭智識一項：

> 科學可以增進家庭生活之能率與幸福，凡普通理科、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對於家庭生活之適當組織效用與維持，皆有確定之貢獻。中學校所訓練者，皆為將來之優秀國民，亦即組織模範家庭之分子，尤不可不有相當之科學教育，以供應其對於家庭所需之智識也。[86]

王蘊章對日用家庭常識的注重，也符合當時出版界熱衷發行此類書籍的潮流。日用類書在中國有其長久傳統：諸如《萬寶全書》之類的文本，從晚明起便大量印行並在民間普遍流通。[87]這種記載著日常生活所需各種禮儀、禁忌與常識的書籍，到了民初仍十分盛行，而且包括商務在內的各家出版社也競相爭奪市場。例如商務在 1919 年出版的《日用百科全書》，便是在六年內刷新到第十三版的暢銷書。商務高層對發行此百科頗寄厚望，不但張元濟在日記中頻頻催促其出版進度，也在各報紙及自家旗下雜誌大登廣告。[88]和傳統《萬寶全書》不同的是，晚清及民初出版的日用類書採用西方科學知識內容，主題和編排方式或許改變，但有些部分仍直接從舊的文本傳抄或擴編。商務《日用百科全書》的特色，就在於系統地編撰時人以爲屬於「常識」範疇的知識體系，既有理化、生理等自然科學與法律、政治等社會科學，也包含沿襲自傳統民間日用類書的簿記、尺牘、楹聯或術數等項目，而不單純是舊文本的改頭換面。季家珍指出，這類文本在內容上新舊混雜的現象，不但代表傳統日用類書適應新

---

[85]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卷 43 期 3，頁 167。

[86]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124；原文亦載於《科學》，卷 7 期 11（1922 年 11 月），頁 1121-1130。

[87]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88] 例如 1919 年 6 月 14 日記載，商務各部門主管商定《日用百科全書》出版日期，計畫印刷廠「每日可出一千部，並擬定添撥印架，及訂書女工」，見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冊，頁 598-599。在《婦女雜誌》上亦多次刊登全頁廣告，預告全書編目，廣告詞云：「本書於日用之知識技能包羅萬有，所採中西科學與新舊事項均應社會各方面之需要，切合實用」，見〈常識寶鑑・職業南針《日用百科全書》〉，《婦女雜誌》，卷 4 號 12（1918 年 12 月）。

時代需求的變化，也反映了民國文化中日常性、有用（usefulness）與新奇（newness）等關鍵的流行概念。[89]王蘊章的編輯志趣與上述這些概念吻合；雖然他沒有參與《日用百科全書》的編輯，《婦女雜誌》裡涵蓋傳統閨秀文藝與現代通俗科學的內容，與《日用百科全書》的知識範疇頗有類似之處。

《婦女雜誌》裡還有一類文體最能彰顯王蘊章重視娛樂教化的編輯特色，就是大量的「科學小說」。以科學爲題材的小說在當時很流行，茅盾回憶 1916 年進商務編譯所不久，《學生雜誌》主編朱元善便請他幫忙找科學小說材料刊登，後來翻譯了一篇從英文舊雜誌找到的科學幻想小說〈三百年後孵化之卵〉。[90]王蘊章身兼《小說月報》主編，本身又積極從事創作，對刊載各類小說的興趣自然不在話下；《婦女雜誌》從創刊號起即有小說專欄，可視爲其《小說月報》編輯事業的延伸。科學小說在第三至五卷尤其頻繁（見附表 2 整理）。王蘊章雖然未寫過科學小說，但從他選擇刊登的作品，就可以一窺他對此文類的重視和品味。值得注意的是《婦女雜誌》裡的科學小說，科幻的成分不高，宗旨著重在以說故事的形式來介紹科學知識。例如朱夢梅的〈中秋月〉，藉由中秋節家人團聚賞月的情節，上過學的姐姐向還是兒童的主角講解月球上缺水與空氣，不能生長人類的眞相，以及月亮盈虧和月食的原理，帶有破除神話迷信的教化意義。[91]有些作品展示出的想像，並非在科學方面，而是在塑造一種不讓鬚眉的新時代女性形象。這類作品以〈女博士〉、〈中國之女飛行家〉爲代表：前者主角是一位受過新式教育的小姐，她的伴讀婢女「癡丫頭」對她講解的理化常識一知半解，鬧出不少笑話，後來癡丫頭繼續研究化學，竟發現新元素，被各國專家肯定；後者主角是一位留學英倫的女飛行員，即使由於飛機故障意

89 季家珍（Joan Judge）著，彭姍姍譯，〈尋找中國的普通讀者——商務印書館的《日用百科全書》與民國時期的知識文化〉，「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商務印書館、中國人民大學，2017 年 8 月 12-14 日。關於日用百科全書與傳統類書的對照，參見于翠玲，〈民國「日用百科全書」：中西知識交匯的樣本〉，收入氏著，《印刷文化的傳播軌跡》（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頁 205-223。

90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頁 108。

91 梅夢，〈中秋月〉，《婦女雜誌》，卷 4 號 10（1918 年 10 月）。

外漂流荒島，也處變不驚平安歸來。[92]人物及情節發展在上述科學小說皆不是重心，只是方便作者敘事寄志的工具，用輕鬆的方式來達到介紹科學知識、娛樂進而教化讀者的目的。

五、從科學家庭到理想社會

五四前的《婦女雜誌》雖然關注的範疇以家庭為主，然而這種日常生活關懷具有更寬廣的社會意識。談論裁縫烹飪等生活常識、改良家政之類的事，乍看之下似乎侷限於居家，事實上蘊含從基層改造社會的宏遠藍圖。以科學改良家政僅為改革的初步，藉由個人在生活中的實踐以及對大眾的教育，論者期望能進而革除中國舊社會中種種弊病——小至忽視清潔的衛生習慣、大至鑽營詐欺的社會風紀。胡彬夏的社論〈基礎之基礎〉即是此類現代化論述的代表。她以孫中山最近演說民權機關政見的時事為引子，[93]在讚揚其政治理念之餘，補充認為家庭乃地方自治之基礎，而「改良家庭即整頓社會」：

> 凡不知修理其家庭之人民，亦不知修理其市鎮。歐美有藏書樓、公花園、小菜場、議事廳、俱樂部，吾國無之。有之自近年始，然如電燈與自來水，西人始攜其法來吾土，吾今仿之耳。凡是諸物，非地方文明之標準乎？而溯其來源，直抵於歐美之家庭。……中國人因習慣於汙穢垢惡顛倒混亂之家庭，其街道市鎮亦致汙穢垢惡顛倒混亂，故改良家庭即整頓社會也。[94]

胡彬夏以為中國「無一光亮之燈、無一適於飲食之水、無一排洩臭穢之渠溝」的落後境況，實應歸咎於家庭的失能，養成民眾得過且過的態度，甚至不良之

92　朱敏嫻女士，〈女博士〉，《婦女雜誌》，卷 3 號 12（1917 年 12 月）；謝直君，〈中國之女飛行家〉，《婦女雜誌》，卷 4 號 1（1918 年 1 月）。

93　此指 1916 年 6 月袁世凱去世後，繼任總統的黎元洪恢復國會，孫文於 7 月 17 日在上海邀參眾兩院議員、各界名流與記者茶會，發表政見。見〈孫中山先生建設政見（錄申報）〉，《婦女雜誌》，卷 2 號 8（1916 年 8 月）。

94　朱胡彬夏，〈基礎之基礎〉，《婦女雜誌》，卷 2 號 8（1916 年 8 月）。

生活習慣。在此狀況下要達成地方自治的民權理想，無異緣木求魚。她認爲唯有教育才是達成改良家庭的途徑，故當普及大學教育於女子，因爲「大學教育能使人見到人所不能見到者，并能做到其所見到者」。[95]這種從家庭出發而改革社會的理念，固然隱含傳統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意味，更由於直接對照西方家庭與公民社會得到的啓發。胡彬夏心目中理想的家庭模範，即爲美式的中產階級家庭。她筆下常描寫在美國生活的見聞，廣受讀者歡迎；前清進士、民國建立後曾任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的徐兆瑋（1867-1940），就曾記錄其閱讀心得：「閱《婦女雜誌》……《社說》錄朱胡彬夏〈美國家庭〉，述美國婦女之處置家事有條不紊，足爲我國婦女對鏡之資，事出徵實，較理論易動人聽也。」[96]

王蘊章雖然是傳統科舉出身的士人，沒有旅美的經驗，他對「改良家庭即整頓社會」的態度卻和胡彬夏一致。王蘊章很少在《婦女雜誌》發表自己對婦女或社會問題的意見，不像胡彬夏勤於撰寫社論。他的看法主要表現於自己翻譯或編選的文章題材，還有在零散的補白裡透露的片段訊息。1922 年發表在《家庭》雜誌的〈理想中之新村〉，是王蘊章罕見直接暢談社會改革理念的作品；[97]當時他已辭卸商務期刊主編職務。王蘊章在此文中含蓄地批評當時氾濫的「新村」。他沒有明確指出所批評的「新村」具體爲何。狹義來說，新村可指五四時期流行的「新村主義」，青年以互助共產爲宗旨，組織成一同住宿生活的工讀互助團，帶有烏托邦理想色彩。[98]王蘊章在文章開頭指出：「新村二字，爲近日一般人士所樂道。思想新穎者，固喜翹此二字以高自標置」，這段話不無諷刺意味。他承認在此惡濁時代，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國誠然吸引人，但

95 朱胡彬夏，〈基礎之基礎〉，《婦女雜誌》，卷 2 號 8。

96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合肥：黃山書社，2013），冊 3，頁 1660，1916 年 7 月 4 日條。

97 西神，〈理想中之新村〉，《家庭》，期 7（1922 年 7 月），頁 1-10。此《家庭》爲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之月刊，勿與其他同名期刊混淆。

98 新村主義發源於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提倡的「新村運動」，由周作人引入中國，發表文章積極介紹並組團赴日考察。新村主義在思想上也受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啓發。五四期間，青年工讀互助團在北京、上海等地紛紛建立，也因諸多現實因素很快失敗。參見趙泓，《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臺北：獨立作家，2014）。

要達成建設新村的理想，必「先之個人爲單位，一家爲原素」。王蘊章傾向務實的作法，建言「苟欲實行新村，請先自掃除一室始。一室有新氣象，則一家亦有新氣象」，接著便抒發他理想中的房舍，從庭園到室內的布置，包括園藝花卉的種植等，頗符合其注重細微事物的風格。他最後總結：

> 大抵園庭之中，必須多栽花木。十年樹木，與人體衛生、家庭經濟，皆有密切之關係。至家庭行政，範圍較廣。吾國人素不注重節育，一家之中，往往人滿為患，兒女眾多，家事因之紛紜雜沓。整理之法，似可區家庭中之一部分為家庭幼稚院，使之隔離，不相混雜。至一家之人，以各事其事、各業其業，實行分工主義，而為互助生活，為惟一之政策。吾國之大病，在一家之中，生利者只有一人，分利者不知凡幾。……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至哉言乎！由一家以推及於一村，由一村以推及於一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99]

由此可見王蘊章秉持過去主編《婦女雜誌》時對衛生、家政的關注，不脫離科學改良家政的論調。再者他又引述《大學》修身、齊家、治國的原則，可見這套由家庭推及社會的論述，和胡彬夏的立場稍有不同，受儒家內聖外王思想影響更爲深刻。這與二人經歷有直接關聯：胡彬夏是長期留學美國的基督徒；王蘊章則是受科舉薰陶的文人，雖然也曾出國遊歷，對西方的認識大部分靠自學得來。

王蘊章也和胡彬夏一樣重視教育，認爲教育是達成改革社會的途徑。在〈理想中之新村〉結尾，王蘊章認爲新村應該「有公學、有化驗室、有衛生處，款取諸公，職員則由村中公舉」。他擘劃出這樣的教育藍圖：

> 莘莘學子，注重實用，職業救國，世所公認。村以新名，尤當人人有自立之本能。每間三年，擇其優秀者分送歐美各國，實地練習，或入專門學校肄業。但期能見諸實用，無徒騖虛名為也。每見海外歸來之學子，高自誇大，問其頭銜，則某也博士、某也碩士，叩其所學，則

99 西神，〈理想中之新村〉，《家庭》，期 7，頁 8-9。

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一藝之微，亦足利人；片技之長，儘可濟世。村中較便實驗，如農場生計、植物改良，化學中如肥料原料等項，機械科中如製造農器之類，開濬工程、建築土木，皆切實有用之學。學無窮境，日進不息。新村之名，庶不至徒貽人以畫虎不成之誚耳。[100]

這裡不但反映了王蘊章注重實用的傾向，也顯示他對某些放洋歸國的新派知識分子的不滿——他並不反對留學，甚至鼓勵出國見習，然而他以爲學問該以實用爲衡量標準，才不至於徒鶩虛名、仿效西方卻畫虎不成。最後的「畫虎不成」，雖然沒有指名所謂何人，隱約可見是呼應文章開頭所稱的「思想新穎者」。王蘊章對女子教育的看法，則與胡彬夏稍有不同。胡彬夏強調大學教育的重要性，且認爲應普及至女子；王蘊章則較保守務實，雖肯定婦人有受高等教育之能力，但認爲以現勢而言，則「普通學識之需要更甚於專門之知識」，[101]所以他對倡導家庭常識不遺餘力。不過王蘊章雖然有自己的主張，在編輯上維持一貫低調而開放的作風，使《婦女雜誌》成爲正反意見皆能鳴放的論壇，無論提倡或排斥女子職業教育的文章，都在《婦女雜誌》刊登過。[102]

王蘊章在〈理想中之新村〉的諍言或許反映了清末民初一批過渡知識分子的心境。這批人是清末從傳統士大夫過渡到現代知識人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既受過國學訓練，也重視西學價值，以嚴復（1854-1921）、梁啓超（1873-1929）及蔡元培等人爲代表；[103]在早期的商務編譯所與管理高層，也不乏這類過渡知識分子如張元濟、杜亞泉（1873-1933）等人。他們奔走於各種文化啓蒙事業，與底層民眾自發性的啓蒙活動互相呼應，也深刻影響後來五四時期的年輕一代。許多反思五四的學者均指出，這批過渡知識分子不認同五四新文化與傳統

100 西神，〈理想中之新村〉，《家庭》，期 7，頁 10。

101 西神，〈婦人與專門之知識〉，《婦女雜誌》，卷 3 號 3（1917 年 3 月）。

102 提倡女子職業教育者，例如胡宗瑗，〈論女子職業教育與道德教育之關係〉，《婦女雜誌》，卷 4 號 10（1918 年 10 月）；持反對意見者，例如震旦大學學生張登仁撰，宋國樞譯，〈說女子教育〉，《婦女雜誌》，卷 5 號 5（1919 年 5 月）。

103 許紀霖，〈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十論》，頁 82-83。

徹底割裂的啓蒙模式，而是採取另一種溫和漸進的「調適型啓蒙」。[104]和杜亞泉同時在商務編譯所擔任主編的王蘊章及胡彬夏，也分享了相同的立場。觀察《婦女雜誌》早期的通俗科學內容，這種延續自清末啓蒙的現象相當明顯，包括破除迷信、勸戒惡俗與注重蠶桑等實業之類的論調，都是清末以來改革社會論述常見的主題。[105]賢妻良母主義、科學改良家政等初衷，也是在日本及西方現代化影響下的改革思潮。無奈時代變換迅速，五四時期在新舊思想鬥爭劇烈下，王蘊章面臨輿論壓力的內外交迫，如同茅盾事後批評的那樣，「冶新舊於一爐，勢必兩面不討好」。[106]

六、邊緣科學：知識範疇的劃界

最後稍微談《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中一些處於灰色地帶的題材。《婦女雜誌》雖然不乏大量破除迷信的教化內容，也同時存在諸如催眠術、超能力治病等具爭議性的文章。以後見之明，或者說從現今通用的科學知識體系來看，這些題材是「邊緣科學」（marginal science）或更具貶義的「僞科學」（pseudo-science）。[107]然而邊緣科學有其無法忽略的重要性：它反映出時人所認定的知識範疇，揭示科學界限在歷史上的模糊和游移，涉及何謂正當的知

---

104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收入田建業等人編，《杜亞泉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序頁 1-20；許紀霖，〈杜亞泉與多元的五四啓蒙〉，《杜亞泉文存》，頁 494-498；高力克，〈調適的啓蒙傳統〉，《二十一世紀》，期 59（2000 年 6 月），頁 156-158；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頁 iv。

105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 1900-1911》，頁 103-119。

106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頁 139。

107 筆者在本文採用「邊緣科學」來泛稱這些在實證科學邊界游移的知識，避免使用更具強烈現實價值批判意味的「僞科學」這一名詞。筆者承認，這樣處理仍不免有用現行預設的科學標準來分類知識之嫌；然而只要是分類，就牽涉到知識或科學的定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劃界（demarcation）的問題，不可能完全「超然客觀」。相關脈絡在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領域已有豐富論述，從波普（Karl Popper）、孔恩（Thomas Kuhn）乃至科學知識的社會學方法，皆從不同角度嘗試處理劃界問題。這方面參考 Seymour Mauskopf 的評論：Seymour Mauskopf, “Marginal Science”, in R. C. Olby et al.,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869-885.

識建構過程，以及科學領域的劃界等關鍵問題。[108]學者也注意到，清末民初之季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無論是直接由西方或經由日本傳譯，並非全然屬於實證科學的範疇，而具有複雜多元的內涵。[109]因此在《婦女雜誌》出現的邊緣科學，如何依本文的分類定義，又如何解釋作者及編者對它們的定位，值得進一步思索。

五四前《婦女雜誌》的邊緣科學文章大多屬於醫藥衛生類，主旨常是新奇的醫療法，無論是以所謂「神通力」的超能力或精神力量治病，或是標榜應用新科技或理論的各種另類療法。這些療法五花八門，例如以節食或禁食的手段來治癒腸胃病甚至肺炎；[110]以照射日光來治療眼疾；[111]以無線電（按文意應指特斯拉線圈產生之交流電）來治療從腦神經、呼吸器到皮膚等全身部位的疾患。[112]上述文章大多翻譯自日文或英文著作，常強調是最新的發明或研究成果。作爲主編的王蘊章不僅熱衷刊登各種醫療新知，本人也多次撰文，整理其研究心得。例如在〈難病之治療法〉中詳細羅列了各種正統或另類的肺結核療法，從高山療法、精神療法、日光浴到艾灸無所不包。[113]這種作法也相當符合他酷愛蒐集編纂資料的風格。王蘊章在這方面的知識尤其偏重日文資料，多取材自日本醫學研究，或在解釋西方名詞時附註片假名。他報導超能力實驗的〈神通力婦人列傳〉，是翻譯自以研究靈學聞名的東京帝國大學心理學家福來友吉（1869-1952）的著作。[114]另外有少數涉及邊緣科學題材的文章，則屬於過時

108 Seymour Mauskopf, “Marginal Science,” pp. 869-872; Larry Laudan,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in R. S. Cohan and L. Laudan, eds., *Physics,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Essays in Honor of Adolf Grünbaum*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 111-127.

109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157-197；黃克武，〈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思想史》，期 2（2014 年 3 月），頁 121-195；王文基，〈導讀：顯而易見〉，收入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著，蔡佩君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xvii-xxxv。

110 例如王庭榦譯，〈斷食主義與一食主義治癒胃病〉，《婦女雜誌》，卷 3 號 10（1917 年 10 月）；惲代英譯，〈禁食療病說〉，《婦女雜誌》，卷 3 號 11（1917 年 11 月）。

111 僾邑譯，〈日光療目法之新發明〉，《婦女雜誌》，卷 5 號 3（1919 年 3 月）。

112 瑟盧譯，〈無線電療病法〉，《婦女雜誌》，卷 4 號 6（1918 年 6 月）。

113 西神，〈難病之治療法〉，《婦女雜誌》，卷 5 號 7-12。

114 西神譯，〈神通力婦人列傳〉，《婦女雜誌》，卷 2 號 10（1916 年 10 月）。

的科學理論。例如起源於古希臘的「體液學說」，認爲人體由四種體液（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構成；體液除了影響人類性格，一旦失衡就會損害健康。體液學說到了十九世紀以降早已被西方主流醫學摒棄，然而在《婦女雜誌》仍偶爾見到引用體液學說論擇偶或兒童個性的文章。[115]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些邊緣科學題材的文章斥爲純粹的迷信。黃克武在討論嚴復與民初的靈學研究時，便指出嚴復並非極端的實證主義者：他抗拒西方科學主義式「科學萬能」的權威及唯物論，對實證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持開放態度。對支持（或至少不排斥）靈學的時人而言，調查催眠術、超能力等現象，皆是最新的「科學」研究，是「超越現有科學的新興領域」。[116]正如前文所提，這些「前沿領域」也不乏歐美或日本學院體制內的科學專家投入撰述，因此其在知識體系內的「合法」地位無論在東西方皆是眾說紛紜的。在這一點知識觀上，王蘊章的態度無疑是接近嚴復的。王蘊章在肯定醫學進步、特效藥問世指日可待的同時，也認爲不可過恃醫生，須「利導人類具有之自然治病力」，所以「不問其爲科學的、非科學的，藥物療法、非藥物療法，一一研究其利害得失」。[117]這種開放的態度，加上前面所提注意蒐羅資料的僻好，使他對各種治療法一視同仁，忠實記錄。

從以上言論，也能窺見王蘊章清楚他所羅列的醫療法，有些是「非科學」的，容易被排除在實證科學或醫療範疇外。作爲一位通俗科學愛好者，他明白自己不是出身專業的侷限。前面提到奉天的讀者姚書翰來函，就是由於讀了〈神通力婦人列傳〉等文章，而燃起採用精神療法治癒痼疾的希望。王蘊章在回信中坦承自己亦是「門外漢」，各種譯作僅從「東西各報獵取而來」，恐負盛意，因此轉請「於醫藥物理之學夙有專長」的朱夢梅回答。朱夢梅的答覆亦平實，雖承認近日流行的精神療法與催眠術有密切關聯，卻不誇張其效果，而以安慰

115 例如胡宗瑗，〈男女宜依生理四質結婚說〉，《婦女雜誌》，卷 3 號 12（1917 年 12 月）；魏壽鏞，〈觀察兒童之個性法〉，《婦女雜誌》，卷 4 號 1（1918 年 1 月）。

116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193-196；引句出自頁 163。

117 西神，〈難病之治療法〉，《婦女雜誌》，卷 5 號 7。

劑效應、心理壓力的案例來解釋所謂精神力，勸慰姚書翰抱持樂觀精神面對疾病，「苟能常存一肺症並非不治之病於胸中，而採用空氣及日光療法，二、三年中，保可身強力壯」。[118]最終仍回歸時下西方醫學治療肺結核較主流的方式。姚書翰來信是在王蘊章撰寫〈難病之治療法〉之前，或許這也是促成王蘊章日後撰文整理肺結核療法的因素。

七、結　論

《婦女雜誌》啓蒙民初讀者科學知識的廣泛影響，早有學者注意並分析，然而大部分研究聚焦於五四後新文化浪潮狂飆的時期，經常忽略五四前的《婦女雜誌》。即便有討論，論者也僅以封建守舊、侷限於家庭範圍等話語，來概括早期的雜誌內容。這種看法有很大程度是沿習新文化知識分子反傳統的立場而來，如同茅盾、章錫琛徹底改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自然對前任主編王蘊章保守的「舊派」思維與刊物內容語多批評。新文化運動的價值之一是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然而這絕不代表五四前的「舊派」人士就「不科學」，或者近代中國的科學啓蒙從新文化運動才開始。開啓民智與破除迷信之類的倡議，早自清末的下層群眾啓蒙就已常見；在文化及出版界中，也不乏杜亞泉這類長期致力於科學傳播，本身卻不認同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主張的知識分子。五四前的《婦女雜誌》豐富的通俗科學內容，可視為清末啓蒙的延伸。雜誌文章內容著重醫藥衛生、家政或教育類範疇的知識，除了反映主編王蘊章、胡彬夏的編輯志趣與現實關懷，也反映當代讀者重視日常性、實用性知識普及的需求。此時期的《婦女雜誌》固然偏重家庭，然而利用科學改良家政，進而從整頓家庭出發改革社會，是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普遍的想法。作為一份宗旨預設為啓蒙女性讀者的刊物，[119]《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中明顯的家庭取向，充分

118 〈復奉天安東縣誠文信書坊姚墨卿信〉，《婦女雜誌》，卷 3 號 5。
119 雖然研究指出《婦女雜誌》的讀者也有不少是男性。關於讀者研究，參見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頁

體現了這種時代思潮。

五四前的《婦女雜誌》倡導賢妻良母，也成爲主張婦女解放的新文化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然而將賢妻良母論述全歸爲守舊派是很大的誤解。賢妻良母並非中國傳統既有，而是濫觴於明治日本，以學習西洋文明開化始，在近代科學理論與國族主義影響的基礎上，強調男女分工、女性有生育健全後代國民之天職的新觀念。隨著甲午戰後學習日本現代化的風潮，賢妻良母主義亦傳入中國，成爲知識分子欲改造女性達成強國保種目標的有力論述。換言之，賢妻良母不是中國傳統禮教的「舊婦女」，反而是近代東亞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新婦女」形象。[120]與其說賢妻良母是守舊，不如說同爲那個時代各種思潮激盪下所塑造的「新女性」，只不過是與五四知識分子想像的獨立自主、個性解放的新女性不同的路線。當時的讀者也常有對賢妻良母觀念的批判，胡彬夏便曾爲賢妻良母辯護說不是「妾婦教育」。她的理念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平權）上，而家庭雖是婦女重要的活動場域，但主婦不是家庭附庸，是治家之主人——猶治國之政治家「公僕」，對丈夫、子女乃至全體社會皆有貢獻。[121]除了賢妻良母思想，科學化管理家庭生產與消費的現代家政學也同時在美國興起並被引入中國。《婦女雜誌》裡大量與家庭常識相關的通俗科學內容，便是在賢妻良母論脈絡下，搭配科學改良家政的理念而產生的作品，無法簡單用「提倡三從四德，專講烹飪縫紉的老調」一語概括。

刊載通俗科學新知文章並非《婦女雜誌》獨有的現象。同時代的其餘商業性婦女刊物，無論是最早創刊的《婦女時報》，或是中華書局刻意要與商務打對臺而出版的《中華婦女界》（1915-1916），也常有家政技藝、育兒方法與醫藥衛生知識等增進讀者常識的內容。它們在形式或插圖上，不時仿效外國同類的家庭與婦女刊物，例如美國《家庭女報》（*The Ladies' Home Journal*），

51-103；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卷 43 期 3，頁 107-190。

120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183-184。

121 彬夏，〈節錄復施淑儀女士書〉，《婦女雜誌》，卷 2 號 4（1916 年 2 月）；彬夏，〈美國家庭〉，《婦女雜誌》，卷 2 號 2。

也常翻譯或改編日文或英文報刊上的文章作爲稿源，呈現出試圖與域外世界接軌的寰宇性質。[122]《婦女雜誌》在這一點上不分軒輊，而通俗科學文章的整體數量與篇幅更勝於其他同類刊物。商業性報刊熱衷刊載科學新知的普遍現象，以及出版市場上日用百科類書的興盛，除了反映普通讀者對通俗教育文本的龐大需求，也顯示了他們對現代化生活的想像與追求。《婦女雜誌》和上述商業性報刊在五四前描繪的科學與現代性，不啻是另一種啓蒙，即使與後來五四新文化啓蒙的方向未必相同。

122 Joan Judge,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pp. 21-27, 117-123.

附表 1　《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分類數量統計（1915-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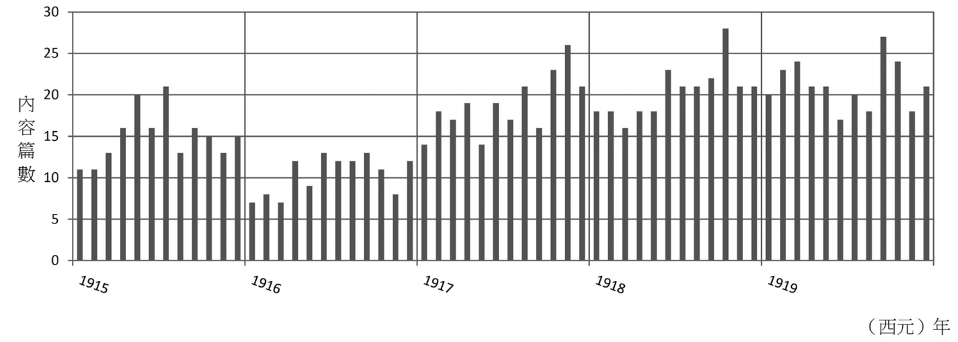
		1915 第一卷	1916 第二卷	1917 第三卷	1918 第四卷	1919 第五卷	合計
數學		8	8	6	7	3	32
理化	物理	13	6	6	5	10	40
	化學	15	7	6	2	3	33
	綜合/其他	9	2	5	4	6	26
地球科學	天文	0	1	3	1	3	8
	氣象	1	1	0	1	1	4
	地質	0	2	1	1	0	4
	綜合/其他	0	4	3	3	2	12
生物	動物	6	4	13	10	16	49
	植物	7	1	1	2	7	18
	綜合/其他	6	3	2	3	4	18
醫藥衛生	人體生理	10	4	18	24	19	75
	醫藥	14	10	26	35	35	120
	衛生	8	5	15	14	10	52
	綜合/其他	18	10	30	28	17	103
實用家政	園藝	5	3	9	6	5	28
	畜牧	6	0	2	6	16	30
	營養	8	2	12	11	16	49
	工藝	7	1	8	7	21	44
	綜合/其他	16	5	11	19	11	62
教育		8	27	30	31	26	122
科技發明		10	6	8	7	11	42
其他		5	12	10	18	12	57
合計		180	124	225	245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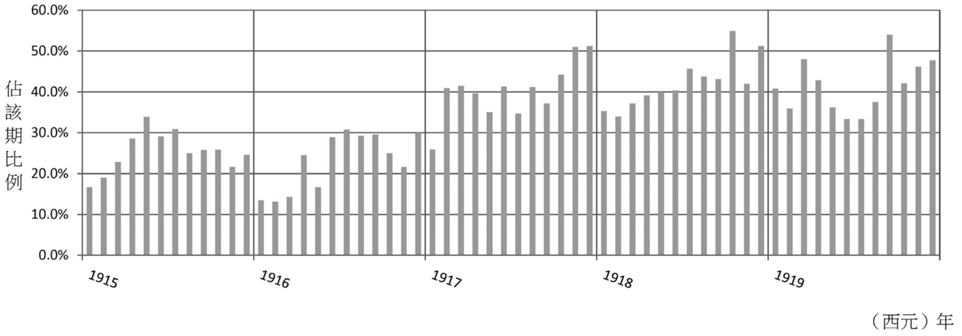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附表1、2及附圖1-3均爲作者整理自製。

附表 2　《婦女雜誌》科學小說列表（1915-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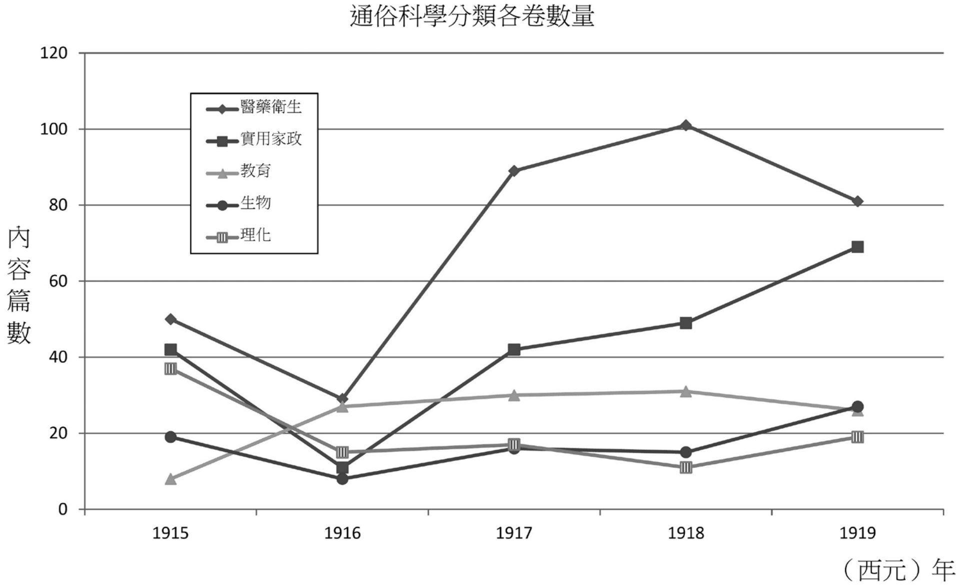
卷	號	標題	作者	本文分類
3	3	算學家	胡寄塵	數學
	11	鳥類之化粧	天臥生	生物（動物）
	12	女博士	朱敏嫻女士	理化（化學)
4	1	中國之女飛行家	謝直君	科技發明
	1	我是蒼蠅	梅夢	生物（動物）
	5	薔薇花語	觀欽	生物（綜合）
	8	蚊之自述	梅夢	生物（動物）
	10	中秋月	梅夢	地科（天文）
5	9	秋之夜	聖陶	地科（天文）
	9	飛機	雲孫	科技發明
	10	虹	張盛之	理化（物理）
	11	悔之晚矣	成玉	醫藥衛生（醫藥）
	11	我兒之日記	胡寄塵	科技發明

附圖 1　《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每月（期）統計（1915-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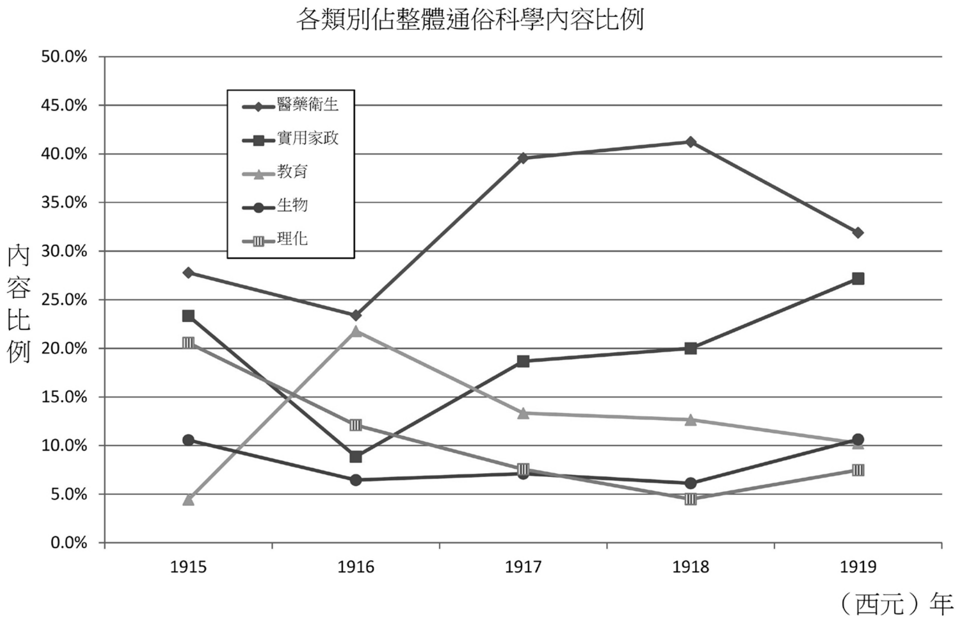




附圖 2　《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分類各卷數量（1915-1919）



附圖 3　《婦女雜誌》分類文章佔整體通俗科學內容比例（1915-1919）



徵引書目

一、史料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冊 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上冊，臺北：國史館，1985。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冊 3，合肥：黃山書社，2013。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02-124。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

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名人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

鄭逸梅，〈詞章名手王西神〉，收入氏著，《近代名人叢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5-286。

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顏惠慶編，《英華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

二、報刊

《女子雜誌》（上海：廣益書局），卷 1，1915。

《女鐸》（上海：廣學會），期 20，1932。

《先施樂園日報》（上海），1923。

《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卷 14，1917。

《社會日報》（上海），1931。

《科學》（上海：中國科學社、商務印書館），卷 7，1922。

《家庭》（上海：世界書局），期 7，1922。

《婦女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卷 1-5，1915-1919。

《新潮》（北京：新潮社），卷 1，1919。

三、專著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 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第 2 版。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

周敘琪，《一九一０～一九二０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爲分析實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

柳珊，《在歷史縫隙間掙扎：1910-1920 年間的《小說月報》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5。

陶海洋，《《東方雜誌》研究（1904-1948）》，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4。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

趙泓，《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臺北：獨立作家，2014。

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謝曉霞，《《小說月報》1910-1920：商業、文化與未完成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香港：中華書局，1990。

Goldstein, Carolyn. *Creating Consumers: Home Economist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Judge, Joan.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ightman, Bernard. *Victorian Popularizers of Science: Designing Nature for New Aud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Secord, James. *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四、論文

于翠玲，〈民國「日用百科全書」：中西知識交匯的樣本〉，收入氏著，《印刷文化的傳播軌跡》，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頁 205-223。

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收入田建業、姚銘堯、任元彪編，《杜亞泉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1-20。

王文基，〈導讀：顯而易見〉，收入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著，蔡佩君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頁 xvii-xxxv。

李仁淵，〈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3-49。

周敘琪，〈家庭經濟與現代主婦——邵飄萍譯介《實用一家經濟法》析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1-50。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卷 43 期 3，2005 年 9 月，頁 107-190。

季家珍（Joan Judge）著，彭姍姍譯，〈尋找中國的普通讀者——商務印書館的《日用百科全書》與民國時期的知識文化〉，「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商務印書館、中國人民大學，2017 年 8 月 12-14 日。

胡曉眞，〈文苑、多羅與華鬘——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69-193。

胡曉眞，〈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2006 年 3 月，頁 55-89。

高力克，〈調適的啓蒙傳統〉，《二十一世紀》，期 59，2000 年 6 月，頁 156-158。

張仲民，〈清季啓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8，2010 年 6 月，頁 51-96。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45-168。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 37-60。

章梅芳、李倩，〈《婦女雜誌》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啓蒙〉，《婦女研究論叢》，期 137，2016 年 9 月，頁 57-67。

許紀霖，〈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收入氏著，《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79-87。

許紀霖，〈杜亞泉與多元的五四啓蒙〉，收入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 494-498。

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爲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38。

陳靜、姜彥臣，〈《婦女雜誌》研究述評〉，《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5 期 4，2015 年 7 月，頁 9-16。

陶賢都、艾焱龍，〈《婦女雜誌》與中國近代的科技傳播〉，《中國科技期刊研究》，卷 24 期 6，2013 年 11 月，頁 1227-1230。

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爲例〉，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233-251。

黃克武，〈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思想史》，期 2，2014 年 3 月，頁 121-195。

葉韋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51-103。

羅秀美，〈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單士釐的「女性文學」〉，《漢學研究》，卷 32 期 2，2014 年 6 月，頁 197-230。

龔鵬程，〈鴛鴦蝴蝶派：民初的大眾通俗文學〉，收入氏著，《中國小說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16-333。

Judge, Joan. “Everydayness as a Critica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The Case of *Funü shibao* (The Women’s Eastern Times).”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0，2012 年 12 月，頁 1-28。

Laudan, Larry. “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In R. S. Cohen and Larry Laudan, eds., *Physics,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Essays in Honor of Adolf Grünbaum.*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 111-127.

Mauskopf, Seymour. “Marginal Science.” In R. C. Olby, et al.,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869-885.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 (November 1984), pp. 37-55.

Secord, Anne. “Botany on a Plate: Pleasure and the Power of Pictures in Promoting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cientific Knowledge.” *Isis,* 93:1 (March 2002), pp. 28-57.

Shteir, Ann. “Gender and ‘Modern’ Botany in Victorian England.” *Osiris,* 12 (1997), pp. 29-38.

Shuttleworth, Sally, and Geoffrey Cantor. “Introduction.” In Geoffrey Cantor and Sally Shuttleworth, eds., *Science Seri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Scien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Periodica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4, pp. 1-15.

Suzuki, Mamiko. “Shimoda’s Program for Jap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2 (June 2013), article 3, pp. 1-9.

五、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2018 年 1 月 10 日檢索）。

胡雨人研究會：http://www.huyuren.com/（2018 年 6 月 26 日檢索）。

Heidelberg University,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oMag*): http://womag.uni-hd.de (accessed 10 January, 2018).

Household Necessities:
Popular Science in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915-1919

Hsiang-Fu Huang*

Abstract

Recent scholarship has notic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Shanghai, to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general readers. However, most studies still focus on the themes of enlightenment that stemmed fro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le *The Ladies' Journal* featured abundant popular science coverage, including medicine, hygiene, pedagogy,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 along with a great number of practical articles on home economics. *The Ladies' Journal*'s emphasis on the family was influenced by two factors: the ideology of ideal womanhood ("good wife and wise mother") from Meiji Japan, and the vision of utilizing science to reform domestic life as well as society. Two of its editors, Wang Yunzhang and Hu Binxia, were pivotal figures in shap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science in the early magazine. Both editors emphasized the need to popularize women's education. Depictions of improving domestic life and popular education in *The Ladies' Journal*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flected a vision of modern life held by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They also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enlightenment different fro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s mode.

Keywords: ***Funü zazhi*, Wang Yunzhang, Hu Binxia, popular science, improving domestic lif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